

## 口述史研究

〔主持人的话〕本刊在第一期“学术新视点”栏目里聚焦的是“口述历史的未来之路”。口述历史从古至今一直就存在,人物访谈也并非近年才出现,但在传统史学里,只被看作史料的一种。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方法,乃至历史学的分支兴起于上世纪中叶,借助于现代录音摄像技术,逐步形成了较为严格的操作模式和学科规范。我国的口述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起步,被广泛运用于史学、民族学、社会学、新闻媒体采访、人物传记、传记文学等领域。90年代史学界开始关注口述历史的学科规范和学科建设问题,2004年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在扬州大学举行;2005年当代四川编委会与当代北京编辑部在成都联合召开了“全国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”;2006年第二届中华口述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江汉大学举办;当代上海研究所分别于2006年、2008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“海峡两岸三地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论坛”。2010年11月20日至23日,当代四川编委会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、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在成都联合召开了“口述历史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”,就口述历史的采访、记录、整理、编纂、出版等操作程序与规范,以及建设中国风格的现代口述史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。本期从五十多篇会议论文中选出章玉钧、左玉河、叶永烈三位先生的文章,以飨读者。

# 从中国大陆口述史发展态势、动因 展望未来之路

◎ 章玉钧

【摘 要】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正在走向繁盛,政要人物、普通民众、人文学者、科技专家、艺术家、媒体人、史学工作者都积极参与其中,大量的口述作品相继推出。同时口述史的发展也面临诸多瓶颈:口述史在历史学科里没有明确的定位;思想文化主管部门缺乏明确的鼓励态度;口述史的水平参差不齐等。未来发展之路需要明确其学科定位,进一步解放思想,整合各方力量,运用现代新的信息技术,不断创新,使口述历史登上新的台阶。

【关键词】口述历史;发展态势;动因;瓶颈;未来之路

【中图分类号】K27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008-0139(2011)01-0031-5

### 一、中国大陆口述史正在走向繁盛

我国的口述历史有着悠久的传统,与十多年前由海外传入的现代口述史的理念和方法相交流、

接轨,在社会巨大变革和环境相对宽松的背景下,由亲历者叙述的各种形式的历史(我所理解的广义口述史)应运而生,正在走向繁盛。

(一)从政要人物作回忆录到普通民众做口述

〔作者简介〕章玉钧,当代四川史编委会主任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,四川 成都 610000。

〔栏目主持人简介〕王林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,博士,四川 成都 610071。

史。各级领导人退下来后,写回忆录的很多。薄一波、杨尚昆、聂荣臻、姚依林、袁宝华、闫明复和汪东兴、吴德等人,都曾是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参与者或在场者,他们的回忆或访谈录,增添了当代史里某些不为人知的史料,有助于人们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了解走过的那段历史。近年来,口述史走入民间,学者对特定群体开展有计划的访谈,普通民众、普通家庭、特殊群体回忆往昔、自费出书的也越来越多。杂志征文广告称之为“老人出书,历史见证”,“家庭出书,文化传承”。我就收到好多本朋友寄赠的这类书籍,有一本书名叫《家山如梦》,扉页题词:“一个家族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云。”的确,这种满含泪花笑语、反映苦乐年华的民众口述史,使我们更能自下而上地看到历史的本真。几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个庞大的群体,知青口述史在全国出了不少。单是四川雅安政协就推出了9大本,每县都有一本。

(二)人文学者、科技专家和艺术家作口述自传蔚然成风,广受欢迎。梁漱溟、启功、费孝通、季羨林等大家都有基于口述的传记(有的不止一种)。98岁高龄的杨绛,不仅有《干校六记》、《我们仨》等自述,还推出了经吴学昭笔录的《听杨绛谈往事》。长于历史传记著述的史学家朱东润写下了他的自传。党史大家龚育之以接受访谈和写生平回忆方式记述的经历,几乎可贯通一生,分别收入龚育之的“访谈录”、“自述”、“回忆”等书中,钱学森自述,以叶永烈访谈笔录的文本最为丰富。黄炎培之子、铁骨铮铮的水利专家黄万里,临终前留下了口述90年人生沧桑的《黄河孤旅》。学者、专家、文人是民族的知识精英,他们的自述,浓缩着民族的精神历史。

(三)口述史记载百年沧桑,既在抢救抗战以来行将湮灭的史料,又在及时跟踪民族复兴和人民走向富裕的历程。如今说得出抗战史实的人都在八十岁以上,老兵的回忆、慰安妇的痛史、南京大屠杀的证词,都是千辛万苦才抢救到的。建国后

的历史,甚至是改革开放初期亲历者的记述,也亟需进行抢救了。口述也能留存当下事件的现场同期声。抗震救灾就引发了口述史的“井喷”现象。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的各县市、施展救援的部队、对口援建的省市,都在以亲历见闻留下这生死营救、举国驰援、大爱涌动、家园重建的历史。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将出版“幸存者说”、“救援者说”、“子弟兵说”、“志愿者说”、“援建者说”等系列专辑,以表达感恩,激励后人。

(四)新闻、出版、影视等传媒和媒体人热情介入并发挥创意,使口述史园地繁花似锦。大陆起码有十几家出版社相继推出口述历史或名家访谈丛书。《炎黄春秋》、《百年潮》、《纵横》等十多种刊物和众多文摘类小报,都以口述史料为主打和卖点。中央台、凤凰台和许多地方台办有引人入胜的口述史专栏,扩大了口述史的受众面。崔永元及其团队制作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记录片,如《我的抗战》(共32集)旨在反映抗战背后每个生命个体的真实感受。在制作中,就采访了3200人,收集口述影像200多万份,历史照片300多万张。参加淞沪抗战的“八百壮士”中找到3人接受访谈,现仅剩一人在世<sup>①</sup>,电影导演贾樟柯深入到成都420厂采访100位工人,整理出《中国工人访谈录:二十四城记》,留下了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付出的沉重代价。

(五)史学工作者通过提倡、参与、采信、提升等方式给力口述史,正在使来自民间的“灰姑娘”容光焕发,有望进入史学正殿。提倡,包括阐释中国史学的口述传统,引进海外有关口述史的理念与方法,呼吁对口述历史“机不可失,‘抢’字当头”;参与,包括接受访谈,写自述,或做采访、笔录、整理、编纂等工作;采信,是在撰写正史、领导人传记或其他史著时,把口述史料同文献、档案、实物等相互印证比勘,把可信的口述“证词”纳入史著之中;提升,是把分散、多样的口述史实践加以概括提炼,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,

<sup>①</sup> 据报载,这位壮士已在近日去世。

进而明确其学科定位,争取它在历史学科的“正册”里占有一席之地。

我们欣喜地看到,中国社科院、当代中国所、近代史所,高等院校和兄弟省市的史学界同仁,都在做很多扎实的工作。当代四川史编委会同大家一起,也在略尽绵薄之力。它的前身是主持撰写《当代中国》四川卷和《当代四川简史》、《当代四川丛书》的机构。在编撰过程中曾录音采访过若干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,那是对口述史的尝试。1999年经省委、省政府批准更为今名后,便把工作重点转到对当代四川人物和要事的口述实录上来,意在为将来编纂《当代四川史》准备史料。2001年正式创办了立足四川、面向全国的口述史交流平台《当代史资料》(内部季刊),已出40期;组织史学工作者围绕我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相关事件和人物开展访谈,约请一些老干部、老学人自述生平,对已去世的则以追思方式座谈、回忆。我们选择部分成果,在2005年和2008年出版了《当代四川要事实录》一、二两辑(今年曾改版为三集普及本)。这次会上,又把刚出版的《要事实录》第三辑即铭记汶川特大地震口述专辑,和以思想、文化、人物为重点的《青史留真》第一辑,以及最近的几期《当代史资料》,一并呈献给各位专家指正。

## 二、口述史兴起的内在动因和瓶颈制约

在和口述史结缘的这些年里,我常为一些公民直笔书史、坦言求真的热忱和执着所感动。红军时代入党的明朗,是省委宣传部的老领导,熟悉当代四川许多要事的来龙去脉,又敢于仗义执言,“在太岁头上动土”。他89岁高龄时,胰腺癌动了手术,预感不久于世,争分夺秒地把他亲历的要事写成文稿交付我们。直到生命的最后半天,还在为纠正某报歪曲“夜袭阳明堡机场”史实的文章去信批评。他的遗文传递给我们的,不仅是刚直不阿的品格,而且有他对健全党内民主,推进社会和谐的人性诉求。96岁的马识途老人继记述文革痛史的《沧桑十年》之后,又在用子女提供的录音设备,把文革前十七年的经历口述下来。他珍视1980年在中央党

校高研班学习时所记的笔记,希望这部记录思想解放的心路历程,凝聚着对正反面经验深刻反思的笔记,能作为后人的“镜鉴”。理解老人拳拳爱国爱党之心,我们已将笔记在《当代史资料》上节选发表。省政协原主席廖伯康回顾“肖李廖事件”的文章,想已为大家所熟知。他讲,重新揭开这处伤疤,是为了化为理性反思,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,凝聚人心,建立民信。

四川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策源地和试验区。我省那些农村包产到户、撤社复乡、企业扩权、中心城市综合改革等大事的亲历者,口述这些往事,都眉飞色舞,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的心情。但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,有关影视、报道对四川的改革探索却尽量回避,甚至移花接木,讳莫如深。亲历者们对此只觉得遗憾和可笑。我还看到过一本口述史料,记的是一群未成年的成都高中生在1958年社教运动中被判为异类,遭到迫害,并株连亲属的痛史。这些花季少年今已年过花甲,他们坦言:为苦难作见证,是希望子孙记住那些苦难,不再有那些苦难。有人评论说:“普通人的见证,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名人、大人物的见证更可贵,更难得,也更重要。”诚哉斯言!

这些事例深深打动了,使我去寻找这些年来口述史蓬勃发展、不胫而走的根本动因。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,经历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,民族从屈辱、苦难中奋进,历经曲折、坎坷,终于走上了令世界瞩目的复兴之路,其间浓缩着太多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,教人刻骨铭心。在世的老人和中年人多是“历经风雨,又见彩虹”,抚昔思今,特别珍惜这和平安宁的日子,希望后代生活得更加幸福。这就产生了把这辈子的经历记载下来,把经验教训留给子孙的迫切要求。在过去文化专制盛行的时期,人们给整怕了,噤若寒蝉,心如死灰,没有口述史生长的条件。如今改革开放,环境相对宽松,人们呼吸到自由的空气,愿意讲也比较敢讲了,口述史便应运而起。从本质和主流来看,驱动人们主动积极地作口述、忆往事的,既不是“雁过留声,人过留名”的表现欲,也不会是对金钱利禄的追求,而是出于



一种公民意识,就是对抢救历史记忆、还原历史真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归根到底,这是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觉醒的表现,正符合建设富裕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现代化社会的需要。

人们常讲: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”不能记住过去的人,便注定要重蹈覆辙。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,是没有希望的民族。我还欣赏陈衡哲教授的一句话:“历史不是教人哭的,也不是教人笑的,乃是教人明白的。”口述史也一样,为的是教人明白,起的是“存史、资政、团结、增智、育人”的作用。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现在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中国。他说中国几乎天天有精彩的故事。中国故事是这个时代的大主题。我们身临其境,为什么不抓紧口述史工作,抢救潜藏在亲历者头脑里还没有讲出来的史料,尽力留下这激荡起伏而又稍纵即逝的历史真相呢?挖掘这些隐形的、不可再生的资源,将是对后代最宝贵的馈赠。

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,有人们保存历史记忆的强烈要求作为内在动力,口述史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是可以预期的,也是难以阻挡的。然而,口述史的现状仍然喜忧参半,困难和问题不少。一是口述史在历史学科里没有明确的地位,没有真正纳入科研和教学的体制内运行。学校没有设置相关的培养方向,作口述历史的人才很缺而且后继乏人。二是思想文化主管部门对口述史缺乏明确鼓励的态度,存在议题禁忌。巴金讲真话的书《随想录》备受尊崇,而他提出的设立“文革博物馆”等建议却不见动静。口述涉及某些事件和人物是犯忌的,令人心有“预悸”。有的书越禁越畅销,有的书“出口转内销”。也有些知情者怕撞上“高压线”,三缄其口,谢绝访谈,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三是口述史的水平参差不齐,有待提高,有的讲得不客观、不实在,炫耀或洗刷自己。甚至有人借“口述史”名义,编造拼凑,兜售私货,需要鉴别和警惕。四是全国搞口述史的机构和力量还没有整合起来,缺乏计划和规范,各自为战,打打停停,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。口述史料、口述史著、口述史学三个环节还没

有贯通一气。口述史料虽多,以口述史料为基础提炼出的口述史著却比较少,在实践基础上研究口述史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口述史学更是尚待建立。只有突破这些瓶颈,解决这些问题,才能迎来口述历史的更大繁荣。

### 三、探寻大陆口述历史的未来之路

(一)明确口述历史的学科定位,将其真正纳入科研和教学的体制内运行。鉴于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新分支,代表着史学发展的新趋势,建议在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里,把中国口述史列为中国史的二级学科。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、中国气派的口述史学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,既要植根于中国传统,符合中国的实际,又广泛吸取全球的相关经验和智慧,探索口述史的多样途径和工作规范。对港澳台同行的经验更要认真吸取。口述历史工作与当代史研究关系特别密切,具有抢救史料、挖掘史实、拓展史域、增进史识等作用,应当成为当代史(国史、党史、地方史)工作者的看家本领和基本功,普遍开展起来,在高等院校和社科院设置“中国口述史”研究生培养方向,培养对口述史“立其志、知其要、有其才”的专业工作者,使口述史工作队伍后继有人并不断壮大,实现口述史学的可持续发展。

(二)进一步解放思想,属守信史求真的原则,鼓励和引导大家来做口述史,为我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智慧。口述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,思想文化主管部门要像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重视和提倡,以抢救历史记忆,复原历史真相为己任。历史学的生命力和价值在于真实性。共和国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,口述史走向兴旺,会更好地弘扬“主旋律”。同时,对曾经的失误和苦难也要正视,不必忌讳掩盖,对这类口述史不宜消极防范。如实地披露,坦诚地评说,倒是有利于凝聚人心,建立民信。如果个别问题确有特殊的敏感性、保密性,也可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抓紧做口述录音访谈,先不公开,以后再择机发表。国家和地方发布社会科学课题指南时,可选择口述历史

的重大课题(例如:中国农民工的人生经历、生存境况和心态变迁)进行招标,对中标者给以有力资助,较大规模地开展访谈和研究,取得有影响力的高质量的成果。社科、新闻、出版等系统评奖时,应当奖励和宣传那些优秀的口述史料、口述史著、口述史学成果,以资鼓励,并起正面导向作用。

(三)整合口述史力量,政、产、学、研形成合力,推动口述史整体向上发展。国史、党史、近代史研究部门,政协文史委,高校历史院系,还有新闻、出版、广电等产业部门,都是作口述史的主体力量。至于口述史的“志愿者”和“发烧友”,更是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。要把领导、队伍和载体三个方面结合起来,采取协会、网络等形式,或者借鉴现代社会结构中NGO非政府组织的形式,搞比较宽松而又有效的联合,实现良性互动,以求打开口述史发展的新局面。我省当代史编委会,是省委、省政府批准设立的机构(没有人员编制),挂靠在省政府办公厅,政协文史委、社科院、党史研究室、地方志办公室都有负责同志作编委会的成员,但过去还没有很好发挥协调共进的作用。这次会议期间,我们编委会同省社科院、建川博物馆群落、川报集团全传媒中心共同设立的“四川当代口述和文献研究中心”,在大邑安仁镇(全国首个博物馆小镇)揭幕。我们愿意把微薄的力量整合进全国的网络,愿意积极参加全国的学术交流活动,期

盼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能够由合作各方轮流举办下去。

(四)运用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,使口述史的制作方式、表现样态、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登上新的台阶。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信息时代,现代信息技术会整个改变社会的生产和生活,当然也会给口述史提供更加多样的手段和更加广阔的前景。不久的将来,口述访谈录下的不仅有声音,而且将接近全息,那时也许不再叫口述史料,该叫“全息史料”啦。口述史工作者要主动邀约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媒体人加盟,发挥文化创意,使口述史既真实可信,又别开生面,更有感染力。要设立口述史资料馆,系统收藏口述史原始文本,音、像、影、视光盘,图书、期刊,以避免珍贵资料散失,并使之得到有效的利用。同时,在互联网上设置口述史数字资料馆,使资料及时广泛地得到传播。

总之,在我的心目中,口述历史的未来之路,是进一步解放思想,突破禁区,抢救历史之路;是明确学科定位,加强学科建设,培养专业人才之路;是促进联合,开展协作,实现良性互动之路;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,发挥创意,不断创新之路。让我们起而力行,在这条前景光明而又充满艰辛的路上不断开拓,共同绘制口述历史的美好明天。

(责任编辑 王 林)